



# 国际共运史研究

---



3

人 民 出 版 社

礼185号6

部大5

**国际共运史研究**

GUOJI GONGYUNSHI YANJIU

第 3 辑

马克思 恩格斯 著作编译局  
中共中央 列宁 斯大林

国际共运史研究所编

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新华书店经销

文字六〇三厂印刷

850×1168毫米32开本 8.75印张 207,000字

1988年1月第1版 1988年1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 0,001—2,300

ISBN 7-01-000082-4/K·36

(书号11001·810) 定价1.80元

## 〈国际共运史研究〉编辑委员会

主 编 李宗禹

副主编 宋洪训

编 委 (以姓氏笔划为序)

刘庸安 李兴耕 张文焕(本辑责任编辑)

胡文建 殷叙彝

本辑技术规格工作由费新录负责

# 国际共运史研究

## 第三辑 目 录

科学地评价共产国际理论、策略在中国

革命中的历史作用 ..... 向 青 ( 1 )

共产国际对各国党的建设的贡献及其存在

问题 ..... 陈再凡 ( 21 )

法国社会党和共产党在第五共和国时期的

相互关系 ..... 李兴耕 ( 39 )

20世纪60年代的美国工人运动 ..... 张友伦 ( 57 )

试论葛兰西的建党理论特色 ..... 张 谦 ( 73 )

巴贝夫和平等派运动 ..... 陈 森 ( 82 )

### 人 物 传 记

秘鲁杰出的马克思主义者何塞·卡洛斯·

马利亚特吉 ..... 张文煊 ( 101 )

德国空想社会主义者亨利希·路德维希·

加尔 ..... 葛 斯 ( 111 )

### 争 鸣 与 探 讨

如何评价1844年德国西里西亚织工起义

——与聂运林同志商榷 ..... 许可成 ( 121 )

恩格斯在晚年是否设想无产阶级在德国

可以和平取得政权 ..... 朱子(135)

### 代表大会介绍

1877年国际社会党人根特代表大会 ..... 唐春华(147)

### 外论选译

民主社会主义 ..... [联邦德国]维利·勃兰特著(157)

李长山译 殷叙彝校

### 文献和资料

马利亚特吉论文选译 ..... [德]何·卡·马利亚特吉著(164)

张文焕译

一、五一节和统一战线 ..... (164)

二、给利马第二次工人代表大会的贺信 ..... (167)

三、秘鲁社会党纲领草案 ..... (172)

四、反对帝国主义的观点 ..... (176)

葛兰西论文选译 ..... [意]安·葛兰西著(183)

田松 李吟波译

一、执政党和执政阶级 ..... (183)

二、向无政府主义者进一言 ..... (188)

第一国际时期德国工人运动史文件 ..... 周志军 刘怀璋译(193)

安运校

一、威·李卜克内西致马克思(1865. 1. 21) ..... (193)

二、泰·梅茨内尔、齐·迈耶尔和奥·福格特

致马克思(1865. 11. 13) ..... (194)

三、奥·倍倍尔致约·非·贝克尔(1868. 7. 16) ..... (196)

四、威·李卜克内西致马克思(1868. 7. 17) ..... (196)

五、给国际代表大会的电报(1868. 9.	
六、给威·李卜克内西的委托书(1868. 9. 22)	(199)
七、卡·威·艾希霍夫致马克思(1868. 10. 2)	(199)
八、古·阿·巴赫曼致马克思(1868. 11. 15)	(201)
九、弗·莫尔致马克思(1868. 4. 6)	(203)
十、威·李卜克内西致马克思(1869. 6. 29)	(204)
十一、威·李卜克内西致马克思(1869. 8. 17)	(205)
十二、莱·邦霍尔斯特致马克思(1869. 10. 25)	(206)
十三、威·李卜克内西致马克思(1870. 4. 27)	(208)
十四、威·李卜克内西致马克思(1870. 5. 7)	(209)
十五、社会民主工党委员会致国际工人协会 总委员会(1870. 6. 12)	(210)
十六、社会民主工党委员会给国际工人协会 总委员会的工作报告(1870. 6. 1)	(211)
西里西亚的贫困和暴乱	[德]威廉·沃尔弗著(224)
	赵小军译
“伯尔尼国际”章程和“维也纳国际”执委会 条例	王学东译(244)

## 书 刊 评 介

《社会主义辞典》评介	殷叙彝(252)
《马克思主义人名词典》简介	徐 汶(261)
《欧洲政党史辞典》简介	常 珊(263)
1986年国内报刊国际共运史论文目录索引	费新录辑(264)

Studies of History of International  
Communist Movement

NO. 3

CONTENTS

The Effect of the Comintern's Theories and Tactics on the Chinese Revolution Should be Evaluated by a Scientific Approach

Xiang Qing

The Contributions the Comintern Made in the Building of the Parties in All Countries and the Problems It Faced

Chen Zaifan

Relations Between the Socialist Party and the Communist Party in the Days of the Fifth Republic of France

Li Xinggeng

The Labour Movement in the United States in the 1960s

Zhang Youlun

A Few Points on the Special Characteristics of A. Gramsci's Theories on Party Building

Zhang Qian

G. Babeuf and the Equalitarian Movement

Chen Sen

J. C. Mariategui, Outstanding Marxist of  
Peru

Zhang Wenhuan

H. L. Gall, a German Utopian Socialist

Ge Si

How to Evaluate the Labour Revolt of 1844 in  
Silesia, Germany

Xu Kecheng

Did Engels in His Old Age Ever Maintain that the Proletariat  
in Germany Could Seize Power by Peaceful  
Means

He Zi

Lexicon of Socialism Published in the  
Federal Republic of Germany — a Review

Yin Xuyi



# 科学地评价共产国际理论、策略 在中国革命中的历史作用

向 青

共产国际在历史上曾经是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组织者与领导者，它的理论、策略对于世界共产主义运动有着广泛的影响，尤其对于中国革命有着特殊的重要作用。所以评价共产国际的理论、策略在中国革命中的历史作用，就成为中国历史学界（包括国际共运史、中共党史、中国革命史）和马克思主义研究者的重要课题。但是，要科学地评价共产国际的历史作用，就必须实事求是地肯定共产国际的历史功绩，也实事求是地指出共产国际的错误，并且正确地估价中国共产党在毛泽东思想指导下的独立自主原则。这三者是相互联系和密不可分的。国外学者对于研究共产国际和中国革命关系非常重视，他们发表了一系列专著和文章，这些专著、文章对我们都有参考和研究的价值。但是，它们的学术观点是各式各样的，其中的一种倾向是全盘肯定共产国际的理论、策略，不准指出共产国际的理论、策略上的错误，从根本上否定毛泽东思想指导下的独立自主原则。1985年7月科瓦廖夫发表的《共产国际在思想、理论上对中国共产党的帮助》一文，就是这一观点的代表作。<sup>①</sup>

<sup>①</sup> E. Ф. 科瓦廖夫苏联历史学博士、教授。他的文章载于《苏共历史问题》1985年第7期。

本文在科学地评价共产国际理论、策略在中国革命中的历史作用中,也将顺便对于科瓦廖夫的观点作些评论。

### 一、科学地评价共产国际民族殖民地革命理论和苏联援助下的国共合作战略

从共产国际成立到中国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失败,是共产国际提出民族殖民地革命理论和形成苏联援助下国共合作战略的历史时期。在这一时期中,共产国际的理论、策略就是阐明民族殖民地革命理论、建立西方无产阶级革命同东方民族殖民地革命运动之间的联系。这一理论在策略上的表现就是形成苏联援助下的国共合作战略。

共产国际对于中国共产党的创建是有很大历史功绩的。为了建立俄国革命同中国革命之间的联系,就不能不建立中国共产党。尽管共产国际第一次代表大会召开时,革命战略的重点是放在欧洲,但它对于中国共产党的建立也仍然具有促进作用。刘绍周、张永奎以“中国社会主义工人党”的身份出席了共产国际第一次代表大会和参加了共产国际的建立,<sup>①</sup>会后刘绍周还成了共产国际的工作人员。十月革命以后的苏俄国内战争,特别是苏俄红军向东进军,于1919年6、7月收复乌拉尔地区,秋天托博尔河大激战,高尔察克军队被击溃,所有这些对于共产国际、苏俄对东方(特别是对中国)的影响是很大的。从1919年3月共产国际建立开始,俄共(布)西伯利亚党组织就在鄂木斯克举行会议,决定建立党与东方国家的联系。6月又建立同东方国家(包括中国)的联络机关东方人民处,而后发展成为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1920年初,俄共(布)同中国的联系又从海参崴进行。维经斯基使华取得成功是俄共(布)长期努力的结果。由于找到了陈独秀、李大钊,使国际共

---

<sup>①</sup> 参看《工人日报》1960年4月21日。

产主义运动同中国革命建立了联系。对此，周恩来说过：“1919年3月共产国际成立后，就派人到各国访贤，做工作。在中国，他们不仅找了陈独秀、李大钊，还找过江亢虎、黄介民和戴季陶；在北方找过吴佩孚，在南方找了孙中山。中国有五四运动的基础，在共产国际的帮助和推动下，很快就成立了中国共产党。”<sup>①</sup>周恩来的论断指明了共产国际在帮助中国建党中的积极、主动的作用。

与此同时，列宁所撰写的《关于民族和殖民地问题提纲（初稿）》是指导东方民族殖民地革命的基本思想，提纲科学地阐明了东方民族殖民地革命理论。当然，在共产国际中阐明列宁的民族殖民地革命理论的不仅是列宁本人，而且还有共产国际的其他领导人。例如共产国际主席季诺维也夫在1922年1、2月远东各国共产党各革命团体代表大会上发表了争取孙中山国民党的谈话；分管东方工作的书记拉狄克在1922年11、12月份的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上发表了《关于东方问题的意见》的讲话，会上通过了《东方问题提纲》；共产国际另一负责人布哈林起草了共产国际关于中国革命的第一个决议《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关于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的关系问题的决议》。<sup>②</sup>在制定苏联援助下的国共合作战略问题上，除了共产国际领导人而外，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在中国也做了大量的工作。

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共产国际在理论、策略方面对中国的帮助更为集中地表现于苏联援助下国共合作战略的形成。那时，共产国际、苏联密切了同中国革命的联系，召回了马林，派来了加拉罕、鲍罗廷、维经斯基。在中国第一次大革命运动的兴起中，

---

① 《周恩来选集》下卷第303页。

② 荷兰莱顿大学学者安东尼·塞奇在《马林和第一次统一战线的起源（1921—1923）》一文中根据马林档案确认这一决议是布哈林起草的。

共产国际的理论、策略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首先，经过鲍罗廷的努力取得了改组国民党的成功，加拉罕在北京同北京政府在《中苏解决悬案大纲》的基础上达成了协议，建立了大使级外交关系，维经斯基在中国推动了中国工人运动。此后，在苏联援助下广州政府平定了商团叛乱和取得了东征陈炯明的胜利。最后，北方发生了北京政变，上海发生了五卅运动，中国大革命高潮终于到来。中国大革命高潮到来后，共产国际支持了中国的工农运动，制定了关于中国的土地政策，派遣了罗易来华。为了说明共产国际、苏联在援助中国大革命中具有历史功绩，科瓦廖夫的文章列举了许多在苏联出版的书籍来加以证明。但是，我们认为：不管共产国际、苏联对中国共产党有多么大的帮助，也无法否认它们在理论、策略上有过错误。实事求是地讲，中国革命的成功和失败都同共产国际有密切关系。而科瓦廖夫的文章缺乏这种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而是伐功矜能、文过饰非，这正是在分析共产国际的理论和策略问题时我们同科瓦廖夫的根本分歧。

从中国共产党建党时期，共产国际就把中国社会估计得过于落后，以至于根本不承认中国有成熟的产业工人阶级。与此同时，共产国际过高地估计国民党的力量和过低地估计共产党的作用，在许多重大问题上，共产国际要求共产党向国民党让步，从而导致中国共产党丧失了无产阶级领导权。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所制定的《关于东方问题提纲》说：“这里的工人阶级——即使其基本核心——也还处于过渡的状态，即正从小行会作坊向资本主义大工厂过渡。”<sup>①</sup>而1923年1月《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关于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关系问题的决议》竟然说：“中国唯一的重要民族革命组织就是国民党。”决议认为“工人运动还很软弱”，工人阶级“尚未

<sup>①</sup> 库恩·贝拉编《共产国际文件汇编》1965年三联书店版第1册第445页。

从其他阶级中充分分化出来成为一支完全独立的社会力量”。<sup>①</sup>

共产国际在中国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中的理论、策略是同这一时期共产国际所召开的三次执委会会议及其决议有着直接关系的。周恩来在谈到共产国际执委会第六、七、八次全会同中国共产党的关系时说：“当时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也对中国问题作了一些不正确的分析，六、七、八三次会议对我国阶级力量的分析都有错误。”<sup>②</sup> 1926年2月17日至3月15日召开的共产国际执委会第六次扩大全会认为“中国民族解放运动走上了组织自己军事力量的道路”，决议竟认为其具体表现是蒋介石、冯玉祥军事力量的建立。决议把蒋介石指挥下的军队作为“争取中国民族独立的支柱”，冯玉祥的军队则被称之为“人民军队”，决议认为这时中国共产党的任务不是建立自己领导下的军队，而是“坚决地支持民主革命军事力量（指蒋介石、冯玉祥的军队）的建立”。<sup>③</sup> 1927年11月22日至12月16日召开的共产国际执委第七次全会关于中国共产党在国民党中的政治地位的论断，则明确地赞助蒋介石的“整理党务案”，说，共产党在国民党中应当“巩固左派，并与之建立密切合作，但共产党人不在其中谋取领导地位”。<sup>④</sup> 共产国际的这一观点，无疑地削弱了共产党在统一战线中的地位。1927年5月18日至30日召开的共产国际执委第八次全会完全为共产国际在蒋介石“四·一二”政变中所持的妥协、退让的立场辩解。到了这时共产国际仍坚持反对对蒋介石进行任何反抗，说：“什么时候应该妥协，什么时候应该转为进攻，这决定于具体条件。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特别

---

① 珍妮·德格拉斯选编《共产国际文件》1964年世界知识出版社版第2卷第6页。

② 《周恩来选集》下卷第304页。

③ 库恩·贝拉编《共产国际文件汇编》第2册第312页。

④ 珍妮·德格拉斯选编《共产国际文件》第2卷第475页。

认为，某些同志就蒋介石的上海政变所提出的策略，是十分荒谬的。这项策略的内容是事先举行起义来反对帝国主义者和蒋介石，或者对它们发起大规模的武装斗争。”这次会议不仅坚持对蒋介石妥协、退让，而且还为向汪精卫妥协、退让制造舆论，说：“武汉政府和国民党左派领导人（指汪精卫等），就阶级成份来说，不仅代表农民、工人和手工业者，而且还代表一部分中产阶级。”<sup>①</sup> 决议要求中国共产党只能赞助他们而不得反对他们。

## 二、共产国际“第三时期”理论和 中国革命中的“左”倾错误

中国第一次大革命失败以后，共产国际为纠正右倾错误，改变了自己的政策。1927年7月14日共产国际作出了《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关于现阶段中国革命的决议》，号召改变国共合作局面，“迅速地改变口号”，“断然打破已经变为桎梏的联盟。”<sup>②</sup> 于是，共产国际召回了鲍罗廷、罗易，而派来了罗明纳兹、诺伊曼。之后，共产国际便强调实行激进的土地政策，支持中国共产党去武装反抗国民党，而且共产国际还从反对在中国建立苏维埃转变到主张在中国实行苏维埃革命。这就是说，共产国际在中国第一次大革命失败以后的一个时期中，它的理论、策略也曾经对于中国革命起过积极的推动作用。

但是，我们要科学地评价1927年到1934年共产国际的理论、策略在中国革命中的历史作用，就必须涉及共产国际的“第三时期”理论。它的基本内容是把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国际形势的发展分为三个时期：战后至1923年为第一时期，是资本主义经济发生尖锐危机和无产阶级革命直接发动的时期；1924至1927年为第二时期，是资本主义经济相对稳定时期；1928年进入第三时期，即

<sup>①</sup> 库恩·贝拉编《共产国际文件汇编》第2册第452、456页。

<sup>②</sup> 珍妮·德格拉斯选编《共产国际文件》第2卷第542页。

资本主义经济“稳定”结束，总危机尖锐化、“大规模阶级搏斗”的时期。这一理论的实质，是把整个推翻资本主义制度作为各国共产党现实的革命目标，从而造成了严重的“左”倾冒险主义错误，也导致了中国共产党“左”倾错误的产生。

但是，按照科瓦廖夫所说，中国共产党内的“异己思想、左右倾机会主义”仅只根源于中国农业落后和受“几亿农民的包围”，而不承认问题的关键是在这些历史发展中，共产国际的理论、策略始终是一个根本性的因素。但是，要全面地解释中国第一次大革命中中国共产党为什么犯了右倾错误，这就不可能不涉及共产国际的理论、策略；同样，离开“第三时期”理论，要全面地解释中国共产党为什么会连续发生“左”倾错误，这也是不可能的。科瓦廖夫的文章完全回避了共产国际的“第三时期”理论，其目的无非是想抹杀共产国际理论、策略同中国共产党“左”倾错误之间的内在联系；同时，他还把攻击的目标转向毛泽东，说毛泽东应为中国共产党的“左”倾错误负责。为了指责毛泽东混淆了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界限，科瓦廖夫竟然认为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九次全会（1928年2月9日至25日召开）在中国革命性质问题上曾经批评了毛泽东，并说：“共产国际执委会第九次全会……确认，这个国家里的群众性革命运动说明了向新阶段的过渡。然而，这不意味着全民族的振兴，而且，不能由此而认为，中国革命正如当时毛泽东所确认的那样已转入了社会主义革命。”科瓦廖夫又说，“李立三不顾共产国际的估价”，错误地估计了革命形势，所以产生了李立三“左”倾错误。他还说：“毛泽东……赞成李立三的观点。”

科瓦廖夫的上述言论具有很大的片面性。历史文件非常清楚地证明，中国共产党内第一次“左”倾错误是同共产国际的理论、策略密切相关的。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左”倾错误起始于1927

年 11 月中央扩大会议，这次会议是由罗明纳兹出席并作指导的，会议接受了罗明纳兹的观点，认为当时虽不是社会主义革命，但一直发展下去就是社会主义革命。<sup>①</sup>之后，在诺伊曼参加下，中国共产党举行了广州暴动。广州暴动失败以前，罗明纳兹在联共（布）第十五次代表大会上发了言，他认为中国革命不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而是工农革命，革命性质具有继续、无间断的性质。<sup>②</sup>广州暴动失败以后，米夫却在联共（布）第十五次代表大会上反驳了罗明纳兹，批评他的中国革命性质是“不断革命”的观点。<sup>③</sup>这一批评赢得了斯大林、布哈林的支持。之后，在共产国际执委第九次扩大全会预备会议上，罗明纳兹、米夫又就中国革命性质问题和广州起义失败的原因问题等进行了辩论，罗明纳兹在苏联《布尔什维克》杂志 1928 年 3、4 期合刊上发表了题为《中国革命的新阶段和中国共产党的任务》文章；米夫也在同期《布尔什维克》杂志上发表了反驳罗明纳兹的文章《中国革命的争论问题》。科瓦廖夫文章所说的共产国际执委会第九次全会所做的关于中国革命性质的批评就是在上述争论的基础上作出的。莫斯科党的出版社出版的、由库恩·贝拉编辑的《共产国际文件汇编》所载共产国际执委会第九次全会关于中国问题决议文件明确指出：“认为现阶段的中国革命已经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的看法是不正确的。同样地，认为现阶段的中国革命是‘不断革命’的看法（这是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驻中国代表的观点），也是不正确的。”<sup>④</sup>共产国际执委会第九次全会决议文件对混淆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界限的批评是针对“共产国际代表”的，也就是针对罗明纳兹的，文件根本没有科瓦廖夫所阐述

① 参看《周恩来选集》上卷第 160 页。

② 参看《真理报》1927 年 12 月 14 日。

③ 参看《真理报》1927 年 12 月 15 日。

④ 库恩·贝拉编《共产国际文件汇编》第 2 册第 502 页。



的那个内容，也根本就没有提及在井冈山从事斗争的毛泽东。而毛泽东在《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一文中明确地指出：“从广东出发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到半路被买办豪绅阶级篡夺了领导权，立即转向反革命路上，全国工农平民以至资产阶级，仍然在反革命统治下，没有得到丝毫政治上经济上的解放。”<sup>①</sup>毛泽东这段话的含意是十分清楚的，即指出中国革命现阶段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而不是社会主义革命。

关于共产国际理论、策略同李立三“左”倾错误的关系，科瓦廖夫认为李立三“左”倾错误产生于“李立三不顾共产国际的估计”，错误地估计了革命形势。但是，事实并不是这样，应该说，李立三“左”倾错误是共产国际“第三时期”理论的直接产物。

李立三“左”倾错误的产生，导源于在“第三时期”理论指导下，共产国际于1929年写给中共中央的三封信。<sup>②</sup>其中特别是中东路战争中共产国际为号召“武装保卫苏联”而发出的1929年10月26日指示信。这一指示信宣布“中国进到了深刻的全国危机的时期”，“现在已经可以并且应当准备群众，去实行革命的推翻地主资产阶级联盟的政权，而建立苏维埃形式的工农独裁”。这一来信提出了“变军阀战争为阶级的国内战争”的紧急口号。在这之后，共产国际执委主席团委员曼努伊尔斯基于1930年3月讲话说：“中国共产党必须不要忘记它代表一种革命因素”，“不能仅仅观望运动”，“不允许自己成为游击运动的参谋部而不去干别的事情”。<sup>③</sup>

① 《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47页。

② 即1929年2月8日《共产国际与中国共产党书》，载《布尔塞维克》第2卷第9期；1929年6月7日《共产国际执委给中共中央关于农民的信》，载《布尔塞维克》第2卷第10期；1929年10月26日《共产国际执委给中共中央关于国民党改组派和中共任务问题的信》，载1930年2月15日《红旗》。

③ 《国际通讯》1930年第10卷第294页。